

翁同龢政治改革思想的演变形成

吴才兴¹ 高婷²

(1 南京师范大学 历史系, 南京 210046; 2 宝鸡文理学院 历史系, 宝鸡 721013)

摘要:翁同龢是晚清政坛上有影响的历史人物和著名的政治家,他的政治思想中最为重要的是他的政治改革思想。在近代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背景下,翁同龢的政治革新思想经历了一个演变形成的过程。起初,对于兴起的洋务思潮,他在认识上经历了从开始的漠视到后来的重视的思想转变。甲午中日战争之后,翁同龢的思想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受救亡图存使命感的驱使和维新思想的影响,他萌生了政治改革的思想,他的改革思想既不同于洋务思想,也不同于维新思想。他政治改革的思想来源和动因,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翁同龢;洋务思想;维新思想;政治改革;思想来源

中图分类号:K249.3 **文献标识码:**A

翁同龢身为同治、光绪帝师,身居清朝统治中心枢纽,是晚清政坛上有影响的历史人物和著名政治家。在他40余年的政治生涯中,经历了晚清许多的重大朝政活动和社会变革,诸如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洋务运动、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等。如果说在前几次事件中,翁同龢所处的政治地位还不足以对事件产生重大影响的话,那么,在甲午中日战争和戊戌变法中,他的影响就是举足轻重和左右全局的了。可以说,在近代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过程中,他与时俱进,对国家和民族作出了有益的贡献,因此翁同龢也被称为“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之一。

自翁同龢1904年去世至今,学术界一直对他进行着研究。尤其是1978年以来,对他的研究有了突破性进展。30多年来学术界对翁氏的研究涉及对他的总评价、他与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及他的开缺原因、人品、人际交往、教育思想、书画艺术成就等各个方面,本文在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晚清社会的新陈代谢以及重大政治、军事事件的发生对翁同龢的影响入手,对他的政治改革思想的演变形成做一些分析和探讨。

—

翁同龢自1856年(咸丰六年)状元及第,步入官场,到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开缺回籍,从政长达40多年,这40多年正是近代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重要阶段,这段时期,清朝政府可以说是内忧外患交相侵逼。为了在新的形势下继续维持统治,清政府开展了历时30年之久的洋务运动,迈出了中国走向近代化的第一步。

洋务运动期间,在统治集团内部,充满了新与旧、中学与西学、进步与保守的斗争,这些斗争是时代巨变带来的结果,但同时传统社会重大历史事件与社会生活的

新陈代谢也会促进人们思想观念上的变化。对于兴起的洋务思潮,翁同龢在认识上也经历了一个逐步转化的过程,也就是从开始的漠视到后来的重视。

1867年奕訢奏请在京师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招收30岁以下的科举正途仕人入学,这一问题很快就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同治的帝师、大学士、守旧派代表人物倭仁上奏强烈反对,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1]。奕訢立即反驳倭仁,并针对倭仁奏折中天文算学世有专家一说,要他据实奏保,另行择地开馆。奕訢还借机奏请倭仁在总理衙门上行走,让对洋务一窍不通的倭仁与洋人交往。在这场守旧与革新的论战中,翁同龢也参与其中。他支持倭仁反对增设天文算学馆的意见,认为倭仁的反对意见尚“未能悉畅”^[2],他为此深感惋惜,在日记中详记了同文馆之争的传闻,称增设之议是“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未同而言,斯文将丧”^[2]。他建议倭仁不到总理衙门任职,并“与商辞折”^[2]。他还认为倭仁与奕訢之争是“口舌相争”的“朝堂水火”^[2],在翁同龢等人的赞同与支持下,倭仁又上奏坚持不设同文馆并推卸总理衙门之职,认为“天文算学世有专家,不必奉夷人为师耳。至折内所陈,原谓立国之道当以礼义人心为本,未有专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天文算学只为未议,即不讲习,于国家大计亦无所损,并非谓欲求自强必须讲明算法也。”^[3]这一奏折就是翁同龢帮助倭仁润色加工的。从这场争论中,人们不难发现翁同龢思想中儒家传统的深重情结。

然而,翁同龢毕竟不同于那些固步自封、盲目自大的顽固守旧派。他早年大治《公羊春秋》,钻研今文经学,力主经世致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责任感趋使他去追踪时代,跟上时代潮流。洋务派给翁同龢带来

作者简介:吴才兴(1988-),男,江西临川人,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2010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历史教学与课程论。

了新事物与新理念。在与洋务派官员的交往中,翁同龢开拓了眼界、增长了见识。郭高燾、薛福辰、薛福成、丁日昌、左宗棠、刘铭传、张荫桓、曾领刚等人给他带来了炼煤铁、修铁路、“破洋人惟有陆战”^[4]、推重洋法等与儒家思想完全不同的理论,翁同龢的头脑中充塞的不再完全是经史之学,西学开始逐步占有一席之地。

对于前后持续30年之久的洋务运动,翁同龢也逐渐越来越关注了。1873年利用回籍丁忧之际,他曾前往上海,参观考察了江南机器制造局,游览了公共租界和徐家汇法式公园,对“夷场”(租界)有了初步的感受。1889年9月再度赴沪,他又参观了机器制造局造炮局、洋枪局及织布局、造纸局等洋务企业,参观了轮船招商局的码头、船坞和洋人所建的天文台、天主教堂和育婴堂,并与洋务派官僚张叔和讨论了有关洋务新政等事宜,为此深感眼界大开,收获极大,增加了他对引进西艺西技的理解。至于和丁日昌订交,支持郭高燾出使英伦,扶持轮船招商局,与文样、左宗棠、张树声等多有交谊等,更说明了他对洋务事业有了日益开明的态度。通过与众多通晓洋务的官僚大吏和出使大臣广泛密切的联系,他对洋务运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思想上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最为值得我们注意的是1889年2月翁同龢向光绪帝进呈了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这部以富国强兵为目的、被视做洋务运动的精神论纲的书。1889年2月21日在养心殿与太后和光绪帝谈及洋务时,翁同龢认为:“对此第一急务,上宜讲求,臣前日所进冯桂芬《抗议》内有谈夷数条,正是此意。”^[5]在当年12月25日的日记中他写道:“看《抗议》,昨言此书最切时宜,可择数篇,另为一帙。今日上挑六篇,装订一册,题签交看,足征留意讲求,可喜^[5]。”抄录成册后送呈光绪帝的,则是其中汰冗员、许白陈、省则例、改科举、采西学、善夷夷等六篇。他将改革思想灌输于年轻的光绪帝,并引导他走上了变法图强之路。

“人生于一社会之中,每为其社会数千年之思想习俗义理所困,而不能自拔”^[6]。随着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和对西方了解的不断深化,翁同龢的思想在无形之中发生着变化。从理论上讲,他已经意识到了要学习西方的科技来抵御外侮。他知道仅凭民族精神与爱国感情不能解决中国贫弱的现状,仅凭个人高昂的救国情怀与热情并不能让在列强虎视眈眈之下的中国自立自强。中法战争后他提出兴建近代海军的思想,称洋务为“第一急务”。他生活的社会环境与中法战争的结局,进一步为他的思想转变打下了基础。

二

真正促使翁同龢思想发生急剧转变的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以清政府的惨败而告终,清政府被迫签订了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战后,帝

国主义列强争先恐后地前来争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面临着严重的危机,但它也像一声春雷,惊醒了沉睡的中国人,激发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爱国热情,人们纷纷寻求救亡图存的道路。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在全国上下一片救亡图存的呼号声中,贵为帝师的翁同龢,也终于逐步解放了思想,冲破了封建思想的重重束缚,走向了革新,迈出了新的步伐。

甲午战争的战败,对于此前坚决主战的翁同龢来说,心中无疑充满了深重的屈辱感。“未正二刻德使海靖来……其于中国不能自强颇致诮讽”^[7],西方人取笑清政府,政府大员们相互唉叹中国贫弱。中国战败、台湾被割,翁同龢心急如焚,“顷因胶事,呕尽心血,卒被人数语割弃,愤惋欲绝”^[8]。面对中国的惨败,中国的国势衰弱,翁同龢主张改革以自强。“不变法,不大举,吾知无成矣”^[9]。甲午战败成为翁同龢明确赞同“西学”以自强的转折性事件。

甲午战后,列强掀起瓜分狂潮。德国强占胶州湾、俄国强租旅大、英国租借威海卫,各国纷纷划分势力范围,列强在中国又斗争又勾结,以牺牲中国主权为相互妥协的筹码,清政府统治危机加重。列强侵占中国主权、瓜分中国利益的现实,使翁同龢清醒地认识到“彼合纵谋我,我为鱼肉”^[10]。在总理衙门,他目睹了列强干预中国内政,德国出兵强占胶州湾,他与德使海靖交涉,不能挽回被占领的局面,他认为这是“最憾最辱之事”^[5]。于是,他提出“中国苟能雪耻自强,兵政必须变法,非将中国旧法扫除而更张之”^[11]。

《马关条约》签订后的翁氏日记笔录,1895年4月30日记有西洋状师科士达的话:“科先叙李相之忠,次言国政,首练兵,改西法,次造铁路,次赋税,其言反复惊切,谓果实力变更,十年后中国无敌,若因仍不改,不可问矣。”^[10]10月26日记下了李提摩太与他的谈话:“尧舜周孔之道,环地球无以易。中土儒者,欧洲敬之,独养民之政衰,圣人之道将不行。五国以中国不能养民,遂欲进而代谋所以养,情已见矣,势已成矣,故中国养民之政不可不亟讲也。政有四大端:曰教民,曰养民,曰安民,曰新民。教之术,以五常之德推行于万国,养则与万国通其利,斯利大,安者弭兵。新着变法也。变法以兴铁路为第一义,练兵次之。中国须参用西员,兼设西学科。”^[10]10月31日又记录了即将离任的英国公使欧格纳的话:“今中国危亡已见端矣,各国聚谋,而中国至今熟睡未醒,何也?且王果善病,精力比继,则宜选忠廉有才略之大臣专图新政,期于必成,何必事是推诿,一无所就乎?”^[10]看来,所有这些来自异域人士的告诫,都在不同程度上触动了他对中国时局处境的感受和认识。

从救亡图存、富国强兵的角度出发,翁同龢与维新派取得了联系并支持他们兴学会、办报刊,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林旭、黄遵宪等人都与翁同龢有了交往。在

他的支持下,康有为与文廷式、陈炽等于1895年8月成立了京师强学会。他决定户部每年给强学会拨银1500两,作为该会的活动经费。康有为在其自编年谱里记载了与翁同龢见面的情景,“翁常熟以师傅当国,憾于割台事,有变法之心,来访不遇,乃就而渴之”^[12]。翁同龢还索要康有为“所著之书”^[13],及历次上书光绪帝的奏折抄本,并摘抄奏本的一些内容,他向光绪帝举荐康有为,成为了光绪帝与维新派之间联系的桥梁。维新派的其它人物如梁启超、谭嗣同、林旭、汪康年、黄遵宪等人也先后拜访了翁同龢,他与黄遵宪就练兵、边防、外交、内政等变法问题交换了看法,他称赞谭嗣同为“通洋务,高视阔步,为世家子弟中桀傲者也”^[10],他认同汤震原著《危言》,评价该书“论时事极有识”^[10],沈曾植也给他带来了开办新式教育学堂,开设国家银行等变法强本之术,盛宣怀也就铁路修筑问题与翁同龢探讨,同时,翁同龢还将《泰西新史揽要》、《日本国志》、《俄彼得变政记》、《校邠庐抗议》等书呈给光绪帝,辅佐光绪帝力行变法。“帝知非实行变法,不能立国,其时同龢辅政,力赞其说”^[14]。翁同龢给光绪帝带来了变革的理念与策略,点燃了这位年轻皇帝变法的心灯。

三

为了自强以抵御外侮,翁同龢认为不仅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且应采用若干“西政”,于是,他提出了一系列变法的主张,辅佐光绪帝展开变法运动。

1898年6月11日,《定国是诏》以光绪帝的名义颁布,由此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定国是诏》是光绪帝引领晚清王朝变法的纲领性文件,也是翁同龢变法的总主张,从《定国是诏》中,我们看到了翁同龢的变革思想。翁同龢在其所拟的《定国是诏》中明确地阐明了变法的总原则:“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这一理论的提出,说明了翁同龢的变革思想达到了新的高度。“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翁同龢认识到西学是不可不讲的,这里的西学指的是西方的军事、自然科学技术及西方的经济教育思想,但是,“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传统的儒家思想与封建专制制度是万古不变的大经大法,这里的传统指的是儒家思想及君主专制制度,他认识到不学西学不足以抵御外侮,但是学西学又使中国社会脱离传统的轨道,经过上一阶段的徘徊之后,他找到了解决的方法:学习西学中促使中国富强的部分,这部分有军事、自然科学技术及经济教育理念等,将西学的这些部分融入中国社会,以便更好地维护传统。于是,翁同龢不仅接受了洋务派的中体西用理论,而且把这一理论用于变革的实践中,并且在实践中逐步体现出他的与洋务思想有联系但又不同于洋务思想的变革思想。

翁同龢这时候的思想不能归于洋务思想的范畴。如前文所述他对洋务运动的态度大致经历了从反对到中

允到支持这么一个过程,虽然他接受了洋务运动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并在甲午战后,在行动上支持洋务事业,积极支持清政府当时的军制改革,支持盛宣怀开设通商银行,督办芦汉铁路,可是由于此时洋务运动已渐趋末路,已经不能代表当时社会的先进思想,并且这时他已受到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激进维新思想的影响,因此,他的思想并不属于洋务思想的范畴。

同时,翁同龢的改革思想也不能完全等同于维新思想。维新思想是继洋务思想之后的又一个影响深远的社会思想。它是由早期维新思想家们在反思洋务运动的过程中提出来的,并且在甲午战争之后内忧外患的新形势下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翁同龢对维新思想有一个逐渐了解的过程,又保持了一定的距离。甲午之前,他对维新思想基本上漠不关心,了解有限。光绪十四年(1888)七月廿九日,他“入署遇曾公,曾公以西学十六种,每部四函见赠,赫德所新译者也”^[5]。对于赫德翻译的西学书籍,他并未详细阅读,而是按习惯记录于日记中,也无任何评论。同年,康有为欲见他,并请他代递上书,也被他拒绝,他认为康有为的上书“语太汗直,无益,只生衅耳,决计复谢之”^[5],对康此时鼓吹的变法、维新之举尚无太大兴趣。甲午之后,他的观点发生了较大转变,“知西法不能不用,大搜时务书而考求之”^[13],仅1895年一年时间就仔细阅读了王韬的《普法战纪》、薛福成的《筹洋刍议》、郑观应的《救时揭要》、陈炽的《庸书》和汤震的《危言》等主张维新的书籍,对于康有为的著作,他也找来仔细阅读。即便如此,他对维新思想依然保持了相当的距离,而对于维新思想中的改革政体、设立议院等主张,他明显表示了不快。如其日记中有:“宋芸子编修来……以所作《时务论》数万言见示。此人亦奇杰,惟改制度用术数,恐能言而不能行耳。”^[15]“陈次亮来辞行,甚郁郁,此人有志富强,惟持论太高。”^[15]“连日得陈次亮信。此君诚奇士,然阅其书,令人不悻。”^[15]翁同龢虽然赏识并提拔了维新巨子康有为,但在思想上与康还是有很大不同的,当他看了《新学伪经考》后,“以为刘歆古文,无一不伪,窜乱六经,而郑康成以下皆为所惑云云。真说经家一野狐也。惊诧不已”^[15],甚至他因见了《孔子改制考》一书而对康大为厌恶。他在日记中记有:“上命臣索康有为所进书,令再写一份递进。对:与康不往来。上问:何也?对以‘此人居心叵测’。曰:前此何以不说?对:臣近见其《孔子改制考》知之。”^[15]这些都说明翁同龢的思想与维新思想有很大差距,不能将这二者等同。

四

如上所述,在晚清社会新陈代谢的背景下,翁同龢改革思想的演进形成,历经了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等重大历史事件,大体上顺应了时代发展潮流、与时俱进、解放思想、追随社会变革步伐、由守旧走向革新。翁同龢能与时俱进、政治革新的思想

来源和动因,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儒家传统经世致用思想的沾染和熏陶

儒家文化学说自春秋战国创立以来,经历代儒者不同程度的阐发、引导和弘扬,发展出一整套明道救世的经世致用理论,其中包含着忧患、变易等关注民族生命与文化生命的思想潜能和动力,是旨在激发人们匡时济世的一种特有人文精神,成为无数中国人为之奋斗的理想人生目标。这一以修齐治平的人世精神为取向、以关涉国计民生的实学为依托的儒学经世传统,一旦外部环境激活和其他条件成熟,尤其是在民族面临严重危机之时,就会产生革新社会政治的愿望。

翁同龢出身于江南封建官宦世家,书香门第,家学渊源深厚,从小饱读四书五经,接受过系统的儒家传统文化教育。1839年翁同龢入当地常熟游文书院学习,年少的他就好读《周礼》,认为“士大夫立志当以周公、孔子为法”^[16]。1845年,16岁的翁同龢以优异成绩考入以通经致用、修身养性为本的苏州紫阳书院,在书院就读的两年中,乃师冯桂芬“尤达于经世之学”^[17]的教诲,对他经世致用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和深远的影响,科考及第并步入政坛后的他,不仅遵循着早年间经世致用的传统学术路向与精神,对先哲前贤的经世品格更是推崇备至,并在博采融通的基础上传承变异,推陈出新。

可以说,对儒家经世传统的继承与发展,是促使翁同龢思想转变的学术动因。

(二)民族危机情况下激发出来的爱国主义情感

危机境况往往催生忧患意识。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风云变幻、波诡云谲,国门被迫打开,传统社会逐步解体,西学不断涌入,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围绕着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社会各阶级、阶层纷纷登上近代历史舞台,在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的驱使下,救亡图存成为人们共同关心的社会课题,图强御侮成为有志者自觉承担的时代使命。有着忧国忧民传统的封建知识分子也不甘寂寞,利用读书人仕占据政坛的有利条件,试图修补在近世风雨中飘摇不定的大清王朝,翁同龢就是作为晚清封建传统知识分子的一员,为了救亡图存,忠心耿耿、鞠躬尽瘁,特别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

当时有人这样评述:“惟有大学士翁常熟,近年省悟大局非变法难以图存。”^[10]目睹外侮日急,国势日蹙,翁同龢每与同僚言谈间忧国伤时的情感时常油然而发。在光绪帝下“罪己诏”后,翁同龢一度奏请革职罢官,认为“割地偿款为从古所未有,既不能力争于未画之前,又不能挽回于未批准之际……此等情形,直同已死”;如今“御押已签,条约已定,皇上当下哀痛之诏,作舍旧之谋,奋发有为,以雪斯耻”^[18]。此后倾向于维新变法的思想萌发,与他对甲午一役痛心疾首的认识是有着密切联系的。

翁同龢政治革新思想的形成,是同他所处的特定时代环境分不开的,是民族危机煎迫下酝酿化成的结果。

(三)鸦片战争后近代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大背景

1840年以后,中国在外力的逼迫下被强行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认识世界、走向世界,成了近代历史的大势所趋。以鸦片战争的失败为开端,急剧变幻的形势,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迫使人们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逐渐清醒过来。人们对外部世界、中外关系的认识,也在由“夷务”到“洋务”再到“时务”的观念嬗变中获得了一个全新的视野。

从学习西方文化的主要趋势和西学传入的主要内容来看,大体上沿着器物、制度、思想三个层面次第展开,明显存在着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具体到抽象的过程。一般而言,学习西方的思潮,有赖于道咸经世派“师夷制夷”的理论倡导先行,继之由洋务派承其后绪,付诸实践,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洋务运动,不少人以“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作为对西学东渐的最初回应,到80年代,先进的知识分子在客观形势的推动下,从70年代所达到的思想高度出发,开始抛弃了把坚船利炮视为富国强兵手段的地主阶级改革派思想,克服了思想上的狭隘性和片面性,拓宽了视野,从依附洋务派官僚的阵营中逐步分化出来,提出了比较鲜明的资产阶级要求,主张以更加广阔的规模和幅度向西方学习,表明了新的社会思潮已经突破了洋务思想的局限,为维新运动的兴起作了舆论上的先导,而翁同龢又适逢这样一个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历史大背景,从而促使了他政治思想的革新。

参 考 文 献

- [1]同治六年二月十五日倭仁折[A]//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二册[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30.
- [2]翁同龢日记:第1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9:519-528.
- [3]同治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倭仁折[A]//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二册[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38.
- [4]翁同龢日记:第3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3:1219.
- [5]翁同龢日记:第4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2:2220-3084.
- [6]梁启超.李鸿章传[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4.
- [7]翁同龢日记:第6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8:2977.
- [8]翁同龢.再翊自画草堂图次前韵[A]//翁同龢诗词集[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58.
- [9]翁同龢.致子京[A]//谢俊美.翁同龢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0:497.
- [10]翁同龢日记:第5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7:2784-2969.
- [11]庞洁公.翁常熟手札[M].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97.
- [12]康有为.康有为自编年谱:外二种[M].北京:中华书局,1992:28.
- [13]梁启超.戊戌政变记[A].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一册[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250-257.

[14]黄鸿寿. 清史纪事本末[A]//中国史学会主编.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 第一册[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 256.

[15]翁同龢. 翁文恭公日记[A]//中国史学会主编.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 第一册[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 510–522.

[16]翁同龢. 瓶庐丛稿: 卷 6[M].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73: 402.

[17]冯桂芬. 显志堂稿[A]//吴大澄序[M].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81: 1.

[18]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 近代史资料: 总 86 号[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56.

On the Evolution and Formation of Political Reform Ideology of WENG Tong-he

WU Cai-xing GAO Ting

(1Development of History,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Jiangsu 210046, China;
2Development of History, Baoji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 Baoji 721013, China)

Abstract: Weng Tong-he, whose political reform ideology is the most important in his political thought, is an influential historical figure and famous politician in Late Qing Dynasty politics. In the context of metabolism of modern Chinese society, Weng's political reform ideas undergone a process of formation. At first, Weng did not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rise of Westernization thought, but later changed his understanding gradually and took effect on the Thought of Westernization. Sino-Japanese War, Weng's thinking has changed dramatically. Driven by the sense of national salvation and the impact of Reformation thoughts, Weng Tong-he initiated the idea of political reform. Weng's reform-minded is not only unlike Westernization thought, but also different from Reformation ideas. The formation of Weng's political reform ideas is the result of many factors.

Key words: Weng Tong-he; Westernization thought; Reformation ideas; political reform; ideological sources

指导教师 张 进 责任编辑 江 珊

(上接第 74 页)

The System of Burying Royal Princess with the Dead Emperor and the Father's Law in the Ming Dynasty

SUN Bing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Ming Dynasty, Zhu Yuanzhang who was the first emperor of Ming and thus called tai zu, restored the large-scale system of burying royal princess with the dead emperor, followed by cheng zu, ren zong, xuan zong, and dai zong. Until the year 1464, this behavior was prohibited by ying zong (Zhu Qizhen). Thus, we could say the system discussed above was completely abolished from the social system. What's more, from then on, it was not lawful for emperors to bury their royal princess, and this rule became a new Father's Law. For this reason, the Father's Law, in the Ming Dynasty, as it were, was a dynamic concept, which was appended or altered constantly on the basis of the Father's Law established by Zhu Yuanzhang.

Key words: burying royal princess with the dead emperor; the Father's Law

指导教师 吴 琦 责任编辑 来 瑞